

doi: 10.3969/j.issn.1671-9247.2025.05.024

创新建构·数智赋能·多元融合:新文科背景下 高师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思考

朱惠强, 崔学荣

(浙江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4)

摘要: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 高师音乐教育人才培养需要创新建构, 突破“现代性”的课程范式, 以多维视野促进课程优化设置。在数字赋能与智能建构的双重合力下推动高师音乐教学模式革新, 突破西方音乐教育话语体系桎梏, 创建中国特色的高师音乐教育话语体系。立足多元融合的全局观, 促进高师音乐教育知识文化建设, 全面提升高师音乐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培养高质量音乐人才, 推动高等音乐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新文科; 数智赋能; 高师音乐教育; 人才培养; 创新建构; 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247(2025)05-0093-05

Innovative Construction·Digital Empowerment·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Reflections o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Liberal Arts Framework

ZHU Huiqiang, CUI Xuerong

(Institute of Music Education, Zheji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Hangzhou 310024,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Within the wave of reform driven by New Liberal Arts,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in higher institutions should adopt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to move beyond the "modernist" curriculum paradigm and promote optimized curriculum design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The combined force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propel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sic teaching model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is approach encourages breaking through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Western-centric discourse in music education, fostering an innovative, Chinese-specific discourse system in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With a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this framework supports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in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enhancing the overall quality and innovative capacity of music educators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he new era and dri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music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digital empowerment; music teacher education; talent development;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提出的人文学科发展新方向。新文科建设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新文科的关键在于其学科导向、问题导向、产出导向。对于音乐教育而言,新文科建设能够推动课程体系改革、促进学科交叉发展、强化美育与文化理解、培养复合型人才、助力构建中国特色音乐教育话语体系。因此,高师院校的音乐专业,若想长远解决其学科地位问题、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特色问题,必须关注并主动参与新文科建设,使本学科从原先彰显个性的专业导向,转型为学科架构清晰、学科特色鲜明、积极参与跨学科建设的学科驱动导向。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我国学者对音乐教育领域在课程体系构建、教学模式创新、专业建设转型、高师音乐教学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已取得较为丰硕的理论

成果。但依然存在“浅尝辄止”或是以“理论框架”宏观阐释的不足之处。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结合新文科建设的理念和动力,以当下存在许久的问题为切入点,分别从课程、教学与知识三大层面,展开高师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的论述,以期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创新建构: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优化与转型

(一) 审视:“失策”的课程范式取向

新文科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科学之现代性的克服与超越,一方面深深地根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之中,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更新与调适;另一方面,也深深根植于外部世界的变化之中,是人文社会科学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高师音乐教育长期受制于“现代性”课程范式的桎梏,渐趋陷入“效能不足”的困境,其实然图景与培养目标已形成显著背离。有鉴于此,亟需依托新文科建设的时代契机,重构高质量的高师音乐教育课程范式,以

收稿日期: 2024-12-02

基金项目: 浙江音乐学院研究生教学项目成果(YTD2025001); 2025年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2025R424A002)

作者简介: 朱惠强(2001—),男,安徽芜湖人,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崔学荣(1967—),女,山东烟台人,浙江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此全面提升音乐领域人才自主培养的质量与效能。

1. 实然：“现代性”主导下的课程范式

“课程范式”即“课程研究者在研究课程问题时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传统、理论和研究形式、研究策略”^[3]。纵观我国的高师音乐教育,无不体现出“现代性”的课程范式。“当今音乐教育学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是基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即基于教育的理性主义哲学观,力求建立以思辨、抽象方法为特征的理性主义教育学。”^{[4][23]}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范式是以现代理论为基础,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吸收并整合了西方传统音乐学与传统教育学的核心思想。高师院校的基本乐理、视唱练耳、曲式、和声等课程,均体现出以“科学的定义和原理”为基础,几乎以“西方音乐”为体系构建知识和课程开设。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从音乐学院的教学制度到各种教学计划和大纲,再到一系列客观、科学、技术性的考试和测试,音乐教学的核心理念都是形而上的,是一套“普适”的教育体系,是一套“西方主体”的音乐体系,试图以一套固定的培养方案来指导任何音乐形式。显然,这种现代性的音乐教育存在的弊端与局限也极为明显。

中国的传统音乐被推向“边缘地带”,音乐教育中人文知识及其文化理解极度缺失。不难发现,如今高校从事传统音乐工作的人群愈发减少,从培养方案到实际落实的音乐教育课程、学生的专业选择情况来看,几乎将传统音乐拒之门外。久而久之,高师音乐教育在“现代性”的课程范式下愈发凸显其“失策”之局面,其培养目标与实然图景已然背离,且愈显乏力之境。

2. 应然：新文科引领下的课程范式

“新文科的核心是现代性反思：因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奠定的那套关于人和社会的知识、信仰和方法,已经面临根本性的挑战。”^[5]音乐学科属于人文科学领域,属于社会科学范畴,遵循人文学科的课程范式。新文科的特点在于：“基于文科的内部融通与文理交叉来研究,基于认识和解决学科本身、人以及社会的复杂问题而提出的,它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和融通性特点。”^[7]新文科建设的路径应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学科壁垒,以解决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旨归,以构建高质量文科教育体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目标^[6]。

由此可见,对于音乐学科而言,新文科不仅有助于推动课程体系的创新与优化,更为音乐学科注入新的活力。高师音乐教育应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由“现代性”课程范式向“人文-理解”的后现代课程范式转向,关注“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新时代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通过课程范式的转型与优化,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推动音乐学科的发展。

(二) 重构：“互融”的课程优化设置

新文科是相较于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学科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

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8]。在新文科背景下,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走向“互融”的局面,拒绝以孤立知识或单一技能为导向的课程设置。

1. 多维视野：课程改革之“基”

高师音乐教育应扎根于多维的学科视野中,不能肤浅地以“西方中心论”的狭隘视野等同于“国际化视野”,进而丧失本土化、民族化的音乐课程身份,形成“反主为客”的局面。应借助新文科建设的时代浪潮,关注课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平衡,亦即通过加强对本土音乐文化、少数民族音乐、世界音乐等当下正处在“边缘化”的课程的有效关注,即“创造性地理解、解释、激活本土音乐知识话语”^[9],强化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兼顾引入西方音乐知识,使二者处在平等、互融、合作的基础上,增进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课程。

“‘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即合理优化课程,注重课程质量,展现文科育人价值。”^[10]优化基础课程体系结构是推动高师音乐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环节,通过整合相关课程内容,将相互关联、具有相似教学目标的课程进行整合,减少重复习得单一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其关键在于促进课程间的有机互动与融合,例如高师音乐教育的和声分析、基础复调与曲式分析这类作曲专业课程可以考虑有效地“兼并重组”。纵观国内的音乐硕士研究生考试,这三门课也被统一合称为“音乐分析”或是“和声与作品分析”,这样“教”与“学”似乎是不在一湖面的两条船,学习这门课的同学深有体会——往往曲式分析中的大部分问题是“和声”导致的,但在和声课上又为其余课程留有“充足的余地”,似乎紧密相关的课程间时常存在“互不相识”的局面。

2. 多向发展：课程转型之“道”

《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解决复杂问题亟须跨学科专业的知识整合,推动融合发展是新文科建设的必然选择。”跨学科融合是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转型之基。“跨学科”的落脚点应关注“打破学科边界”并关注课程设置的“与时俱进”。“打破学科边界”即课程视角应由“单一学科体系”转向“多学科互通”与“跨学科融合”,以单一视角去审视音乐易造成失去标准的“闭门造车”,而“打破学科边界”的关键就在于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教育框架,既尊重音乐学科的独特性,又将其置于更广泛的知识体系中,尝试跳出音乐的视角去看音乐,而不忘音乐之本,加强各领域间的联动与协作,互为主体、双向促进。

“与时俱进”是高师音乐人才培养立足于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之关键。高师音乐教育体系应关注课程知识内容的转型升级,对接中国自主人才培养体系。应有效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培养跨学科与综合运用能力,摒弃以恒定、静止的思维去进行“流水线式”的课程开设。综上,依据新文科的时代诉求,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范式,即高师音乐教育的课程应关注以下几大素养:(1)注重基础课程与特色课程兼具的课程模式;(2)本土化课程与国际化课程的有机平衡;(3)跨学科与跨领域融合;(4)注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5)加强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6)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全面提升高师音乐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推动高质量音乐人才的培养。

二、数智赋能:高师音乐教育的教学模式革新

(一)“数字赋能”催生高师音乐教学模式

《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进一步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新文科建设势在必行。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日益成为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在加速教育变革,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教育转型的方法选择、技术方案和应用场景,还包括它作为“智慧工具”在哲学和思想层面赋予教育的新向度。

新文科强调以新技术突破传统教学思维模式,教育数字化赋能正是实现学习革命和提升教育质量的创新路径。高师音乐教育应在新文科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合力赋能下,注入新的教育命脉。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教学资源的整合、教学模式的创新和课堂教学的变革是新时代音乐教育的关键。

1.“数字赋能”变革教学方式,立足“场景驱动”的“互联网+教育”

建立“跨学段教学联动”与“跨场域教学整合”的高师音乐教学协同机制,探索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新型教学模式,逐步推动教学模式从单一的传统课堂教学向线上线下结合、课内课外融通的多元形式转变。正所谓“教学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应不断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教育的新途径,推进教学方式的系统性变革”^[1]。高师阶段音乐课程可通过建立“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这里的“线上”并非指“学习通”等应用中的网络教学视频,而是要借助数字平台,让音乐学习变得更加“可视化”与“能动性”,比如,和声学习不应片面关注学生在乐谱上标注和声进行,过分强调“科学性”与“标准性”,而应辅以数字化的应用助力学习,诸如Chordie、Tonica Fugata等,数字应用中虚拟键盘识别、实时显示和声进行,让乐谱与和声同时可视化地进行,帮助学生更好地在动态过程中理解和声进行,进而感知整个作品。借助数字化信息媒介,建立音乐教育的“跨学段”课程体系,关注数字信息化时代学习的有效衔接与联动,优化学生的学习路径和体验,促进个性化学习道路,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对教学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提供个性化的教学建议和改进措施,提升教学效果。

2.“数字赋能”提升教学方式,立足“数字素养”的课堂教学

在新文科与教育数字化转型建设的双重合力下,应充分重视教师、学生的数字素养与应用能力。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的挑战,必须把数字素养与胜任力作为教师的必备素养,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助推教学质量提升。因此,全面提升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既是扎实推进数字人才战略的重要支撑,也是促进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在^[1]。

立足“数字素养”的高师音乐教学应具备理解和适应数字化教学环境与掌握应用数字化学习方法的能

力,并养成终身学习、更新技术知识的思维意识,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教育的发展趋势,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对教师而言,加强教师数字素养和应用能力培训,在多元的学习环境中探索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创新;完善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数字素养评价体系,将数字素养同科研能力、教学能力放在教师综合素养的指标中;激发教师提升数字素养的内生动力,努力打造顺应时代发展的多元素养教师队伍。对于学生而言,激发和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和适应力。完善学生的数字素养培养体系,从课程开设到培养方案落实应兼顾适应“数字化”环境的学习方式。坚持教学数字化转型所倡导的“学为中心、需求拉动、人机协同”等变革理念,为传统的高师音乐教学持续赋能。

(二)“情境互动”引领音乐课堂教学变革

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教学模式依然根植于“主客二分”认识论哲学,并深受“行为主义”心理学范式的支配,致使高师音乐教学课堂多以单向知识传授模式为主,缺乏多样性和深度;教学重点强调技术和理论的掌握,常常忽略音乐背后的情感与人文内涵,音乐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判断被“形式化”的音乐概念所淹没;教学评价多为理性、单一的评价方式,倾向于评估学生对知识掌握程度,进而忽视了学生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

在新文科发展背景下,高师音乐教育需要从传统的“主客二分”认识论和“行为主义”心理学范式中解脱出来,转向注重学生主体性和情感体验的教学模式,以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人才。因此,高师音乐教学应关注建构主义所强调的“情境范式”,注重理解性、互动性学习,关注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及知识结构的网络化,倡导情境性教学^[2]。学习应该与情景化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而不是只存在于学习者头脑内部的过去情境化的实体^[3]。

1.关注“情境”:走向“真实情境”的知识建构

关注教学中的“情境”的第一重境界是“相遇”,“把现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从原有知识经验中‘生长’出新的经验知识”^[3],这与荀子《劝学》中的“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均体现出“相遇”的力量,即建立学习者与新的知识、技能或环境的“陌生而熟悉”的初步接触和体验。学习并非独立于原有经验认知的抽象存在,而是不断在新旧知识中扩充自己知识版图的良好过程。因此高师音乐教育应由传统、单一的行为主义范式向情境范式转变。

“情境”的高维境界层便是“会话”,学习者在“相遇”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解和内化知识,师生、学生与知识环境的动态互动,通过“会话”构建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能力,“会话”更强调“浸泡式”的深度学习,是扎根于“情境”的具体体验,音乐教学在“会话”中,“教”与“学”进行犹如挚友般的洽谈,真正实现教学过程中的“双向互动”与“教学相长”,突破分离与离散的单项知识传授模式,打破教与学之间长存的界限,收获“心流”般的无穷生命体验。

2.聚焦“互动”:探索“教学全程”的有机互动

在新文科的动力下,高师音乐教育应把握“教与

学”之间的有机互动,“互动”与“情境”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若将“情境”理解为给知识敞开的大门,那么“互动”便是开启这扇大门的钥匙。正如维果斯基强调“学习与理解需要互动的对话”,佐藤学也曾指出学习实践中的三种“对话式”的互动关系,分别为同客观世界的对话、同他人对话、同自己对话^[14]。由此可见,教与学的关系深深扎根于“互动”的有机土壤中。音乐是一种语言、是人类情感表达和社会交流的重要方式,是促进人与人相处、建立关系的重要媒介。而缺乏“互动”的音乐正如机械的音符排列,缺乏情感的共鸣和思想的共振,令人难以产生共鸣和体验到情感的丰富性。

高师音乐教学过程中正是长期存在这种教学间缺乏沟通、知识间缺乏迁移、理论与实践存在持久的鸿沟等静态的局面,这使得音乐教育成为一种脱离人、脱离语境、主客分离的存在,但这并不是音乐,更不是音乐教育应有的样貌。因此高师音乐教育应由“孤立”的离散迈向“互动”的构建中,由教学的单一身份主体转变成多元主体互动,由单向的知识传递变为交流和共生的过程,由技术理性走向人文关怀,建立一种对话、交流、理解的关系,打破长此以往孤立、分离的局面。

三、多元融合:高师音乐教育的知识范式转向

(一)破局:高师音乐教育自主知识话语体系的构建

何为“话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其演讲稿《话语的秩序》中对其进行了深入阐述:话语是真理、知识和权力的集中表现,是生活主体和对象能够相互交融的地方^[15]。海德格尔也提出“语言即思”的哲学命题,“语言即思”颠覆了传统的说话者和语言之间的“说与被说”关系,一种说话者主体和对象主体(语言)之间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的“主体间性”关系。话语体系具有标识身份、凝聚共识、培育认同的价值^[16]。由此可见,“话语”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一,是构建人际关系、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对于“学科”而言,“话语”是构建知识体系、形成学科认同的重要机制。

1.桎梏:深陷西方音乐教育话语体系之“困”

“中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无论从课程门类的设置、课程内容的知识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等还是沿袭西方音乐传统,音乐课程内容仍然以西方音乐为传承的主流文化。”^[17]当下高师音乐教育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支配下,不知不觉将中国传统音乐推向“边缘”,中国传统音乐地位被大肆矮化。中国传统音乐用西方基本乐理作为跨文化音乐的解释基础,本土音乐知识在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文化主体性丧失,在高校的音乐教育体系里,传统音乐更是成为学科“边缘”,仅有少量的传统音乐也是在西方音乐本体形式的控制下夹缝生存。“那些蒙古族的长调、藏族的牧歌、汉族的地方性民歌等一旦被纳入学校教学,就像将那些有生命力的音乐被制成了客观的、科学的标本,这一问题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不但没能得到解决,并且得到不言自明的默认,便是地方性、民族性的音乐不适合于科学的教学或属于另类、次类的教学。”^{[4][125]}

2.挣脱:构建中国特色的高师音乐教育话语体系

何以破“西方中心论”下的音乐教育话语体系桎

梏之局?对此,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高师音乐教育话语体系之重任刻不容缓——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挥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构建具有本土特征的高师音乐教育“话语”在新文科背景下刻不容缓。对于人文学科的音乐教育而言,应该摒弃通篇以“物”和“理”的视角去审视音乐教育,应将目光多投向人文学科的观照中。以我国本土音乐、地方性知识、本民族文化为“根”,建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观,自觉传承母语音乐文化传统。对于教学方法的运用要“因地制宜”,对待中国“板”和“眼”不能一味地以“节奏”一词代替,我国民族特色的“腔音”切不可生搬硬套地将西方的“装饰音”加以解释。

高师音乐教育要重视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和传承,从课程开设、培养目标到具体落实环节,应把握“何为主体”的观念,扎根音乐母语传统并有机融入“三大文化”(即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实践‘活’的方式和创新、生长的状态,辩证把握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内涵”^[17]。如何切实落实到具体教学实施,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高师音乐教育话语体系是当前中国音乐教育领域面临的重要课题。将西方现代性的知识观转向人文学科的音乐教育话语体系,通过借鉴和吸收中国哲学理念和文化传统,中国音乐教育学方可摆脱西方音乐教育话语体系的束缚,构建具有本土特色和中国智慧的音乐教育理论体系。这不仅有助于中国音乐教育学术的独立发展,也能够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智慧,为世界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二)融合:立足“多元融合”的高师音乐教育知识文化建设

中国高师音乐教育,应以中国立场、视角、价值和方法,分析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提升人才培养战略。如何理解“中国性”与“自主性”,是高师音乐教育“守正创新”的根基。所谓“中国性”,是在融通古今中外之上的时代化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即新时代的中国性和中华民族性;“自主性”即一种主体性,不仅要在中国教育学知识生产环节中体现出核心的原创性,更要在应用环节担当“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解决人类教育问题的中国方案”的重任和使命^[18]。

如何做到“融通古今中外”并着力“提出解决教育问题的中国方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应秉持“融合”的理念,以培养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音乐人才为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音乐教育体系,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贡献力量。

1.“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跨文化理解

在“建设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命题的驱动下,高师音乐教育必须从单一文化中心论转向文化多元论,探索音乐跨文化理解的多元主体思维。《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关于世界文化音乐的政策》提出:“充分展示本土音乐、西方艺术音乐以及外国音乐,使之成为所有国家正规教育课程中的一部分。特别注意加强本国各民族和各社会群体的音乐。”^[19]从单一文化中心论转向文化多元论,打破单一音乐观念束缚,从音乐自身的文化中探寻音乐存在的价值及其人文意蕴。

关注课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平衡的文化理解。在高师音乐教育中应摒弃“西方中心论”的知识霸权与话语独裁,以“中国音乐”为根基,给予地方性音乐、本土性知识等“边缘化”知识更多的关注,创造性地理解、解释和激活本土音乐“知识话语”,强化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知和传承,兼顾引入西方音乐知识,使二者处在平等、互融、合作的基础上,增进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既要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注重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创新,促进课程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平衡,推动“创新不离根”的发展路径,形成“师生联动”的教学模式,从而培养出既有文化自信又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音乐人才。这不仅有助于中国音乐教育的独立发展,也能够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智慧,为全球音乐教育事业做出中国的贡献。

2. “多向互动”的音乐教育:跨视野合作

王耀华在《音乐守正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一文中指出,新时代中华民族音乐需“双向互动交流”,即“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重视中外音乐文化的国际交流”^[20]。“双向交流互动”即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

纵观高师音乐教育,我们诚然注重中外音乐文化的国际交流,但似乎也仅限于与发达国家的单向交流,且中国本民族音乐的“我者”会在这种“交流”中不自觉消解成“他者”,体现出一种“后殖民”色彩。而“多向互动”则突破西方文化霸权,“在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基础上,合理吸收和利用西方教育理论对中国音乐教育现实问题做出创造性解释”^[2]。这不仅包括与欧美国家的音乐文化交流,还应面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民族的音乐界,实现广泛的、深刻的、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多元主体”交流,是各主体间平等、会话、协作的“双向给予”的关系,体现出各文化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的“共生”关系。

“多向互动”的视角强调交流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进行全过程互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单方面影响^[20]。不同文化主体应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外来音乐文化,同时结合自身的体悟,对其进行消化和融合,使之“为我所用”,而非“失去自我”。充分理解和借鉴各国音乐文化的精髓,推动中华传统音乐的创新和发展,应以“平等对话”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积极吸收和融合外来音乐文化元素,同时坚持本土音乐文化的主体地位。

四、结语

在新文科背景下,高师音乐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应突破“现代性”的课程范式的藩篱,以“多维视野”促进课程优化设置。同时,在“数字赋能”与“智能建构”的双重合力下推动高师音乐教学模式革新,提升师生的数字素养,推进高师音乐教育数字化改革;建

构“情境互动”的教学模式引领音乐课堂变革,创新教学方法。在“多元融合”全局观的引领下努力突破西方音乐教育话语体系之桎梏,构建中国特色的高师音乐教育话语体系。借助新文科之力,构建高质量高师音乐教育范式,促进高师音乐教育知识文化建设,全面提升高师音乐人才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适应新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

参考文献:

- [1]权培培,段禹,崔延强.文科之“新”与文科之“道”:关于新文科建设的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1):280-290.
- [2]朱玉江,张惠婷.实然图景与应然诉求:中国音乐教育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J].人民音乐,2019(4):80-83.
- [3]靳玉乐.现代课程论[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28.
- [4]管建华.后现代音乐教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5]陶东风.新文科新在何处[J].探索与争鸣,2020(1):8-10.
- [6]张清俐,张杰.新时代新文科新使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11-24(6).
- [7]张天彤.知行合一 双向奔赴:“新文科”背景下少数民族高层次音乐学人才培养的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2022,35(6):103-110.
- [8]王铭玉,张涛.高校“新文科”建设:概念与行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03-21(4).
- [9]朱玉江,储冀璇.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J].人民音乐,2021(5):44-48.
- [10]韩忠岭,崔学荣.中国高校音乐学科“新文科”改革三思[J].中国音乐教育,2023(9):5-10.
- [11]李艳燕.智能时代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挑战与路径[J].闽江学刊,2024,16(2):157-163,175.
- [12]郑茂平,江琦.音乐教育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33.
- [13]张大均.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32,95-96.
- [14]佐藤学.学习的快乐[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
- [15]Dreyfus H L, Rabinow P.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4: 15.
- [16]孙元涛.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J].教育研究,2018,39(12):30-39.
- [17]崔学荣,汪洋.论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构建[J].中国音乐,2023(1):25-33.
- [18]陈洪捷,侯怀银,余清臣,等.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笔会)[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11(3):15-39.
- [19]管建华.中国音乐教育与国际音乐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35.
- [20]王耀华.音乐守正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J].音乐研究,2021(4):102-111.

(责任编辑 汪继友)